

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

——基于福建省 1476 个农民工的调查

卢海阳¹ 李祖娴²

摘要：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 2016 年福建省 1476 个农民工有效样本，应用描述性方法从教育、工作经验、健康和培训等维度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及其群体差异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农民工未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水平的高等教育，但他们对子女教育却有较高的期望；将近七成的农民工认为子女就学受到歧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歧视感知尤为强烈。农民工平均务工年限将近 12 年，但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较强，工作经验积累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多数农民工健康状况较好，相对于本地农民工，迁移对外出农民工所造成的健康损耗更明显。农民工有较强的参加培训意愿，但也面临较大的经费负担，农民工在培训时间和培训内容偏好上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最后，本文提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 人力资本 健康 培训 群体差异

中图分类号：C97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进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行业从事非农工作，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贡献了重要的人口红利，也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重要的比较优势。为了把握农民工总量的变化趋势，国家统计局于 2008 年建立了农民工监测调查制度，在农民工输出地开展监测调查。从总量来看，近年来中国农民工数量正在逐年增长。艾小青（2015）对各年度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分析表明，2008~2014 年间，中国农民工总量大约增长了 0.5 亿人。《2016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末，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 2.8 亿人，比上年增长了 1.5%（国

*本文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农民工健康及其促进机制研究”（编号：716030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及其健康效应研究”（编号：16YJCZH065）和福建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福建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培育途径研究”（编号：2017R0010）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家统计局，2017）。

然而，农民工总量的增长却并不能扭转中国劳动力日益短缺的大趋势。根据蔡昉（2013）的研究，自2012年开始，中国城乡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就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并预测2010~2020年间，中国处于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累计减少近3000万人。与此同时，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水平也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意味着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将逐渐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很可能成为今后长期存在的问题，这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Zhang et al., 2011）。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和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中国必然经历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这对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蔡昉、王美艳，2012）。农民工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有效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农民工人力资本问题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根据舒尔茨（Schultz, 1961）的定义，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通过教育、培训、工作经验、迁移等方面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Becker（1962）在此基础上扩展了人力资本的内涵，认为除了知识和技能以外，人力资本还应包括健康和生命。纵观现有文献，多数研究将人力资本视为自变量，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例如苑会娜，2009；Magnani and Zhu, 2012）、返乡行为（例如李强、龙文进，2009）、社会融合（例如谢桂华，2012）和创业行为（例如周广肃等，2017）等多个方面的影响，这类研究可以归类为农民工人力资本后果的研究。也有一些研究将人力资本视为因变量，探讨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因素。例如，李宝值等（2016）利用浙江省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技能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社会资本显著地促进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投资。何亦名（2014）将人力资本投资视为一种能给人带来“成长效用”的消费支出，分析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收入水平提升能显著地促进“高成长效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但对“低成长效用”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不显著。此外，还有少量研究探讨了农民工不同类型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较为典型的是关于教育对健康影响的研究（例如黄乾，2010；胡安宁，2014；程令国等，2015）。Song and Sun（2016）和Lu and Qin（2014）则从健康经济学的视角实证检验了迁移经历对农民工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

相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后果的研究和影响因素研究，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的统计分析还比较缺乏，而深入了解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对制定相关政策是十分必要的。现有文献中只有少部分学者对农民工培训现状（例如罗万纯，2013；卢小君、张宁，2017）和健康现状（例如蒋善等，2007）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性分析。然而，已有研究却忽视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的群体差异，所得到的政策建议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针对性。显然，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在人力资本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和受教育水平通常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老一代农民工由于在外务工时间较长，在某些技能方面则可能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熟练。为了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需要了解清楚不同群体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和自身的职业技能需求情况，为制定明晰群体差异的有效政策提供经验支持。鉴于此，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农民工按世代、性别和户籍地分组，采用实地调查数

据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及其群体差异进行描述性分析，以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二、样本概况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对福建省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前三的泉州、福州和厦门三个地级市的农民工问卷调查。调查时间集中在2016年7~8月，调查对象是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城市地区从事非农工作且散居于城市社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囿于农民工群体较强的分散性和流动强，难以获取农民工的总体抽样框，该调查以这三个地级市的常住人口比例和计划调查的样本总量为依据计算每个地级市的调查样本数量。调查采取偶遇抽样的方法，以农民工口述、调查员填写问卷的方式采集数据。调查内容涉及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家庭基本情况、就业情况、消费状况和对各种社会现象的主观感知等方面，本文主要侧重考察农民工在教育、健康和培训等方面的人力资本状况。该调查共发放问卷1578份，剔除问卷回答中内容前后矛盾或关键变量数据缺失严重的问卷，有效问卷总量为1476个，有效率为93.54%。

表1描述了调查样本的分布情况。从性别分布来看，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分别占样本总量的68.16%和31.84%。从世代分布来看，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4.36%，1980年以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占35.64%。从户籍来源地来看，市内流动的本地农民工占样本总量的47.02%，跨市和跨省流动的外出农民工则占52.98%。从流动类型来看，家庭流动的农民工和个人流动的农民工分别占样本总量的45.93%和54.07%。从行业分布来看，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例最高，占22.34%；其次是电子和机械制造业，占19.62%；从事交通运输业和环境卫生业的农民工比例则较低，分别只占样本总量的4.63%和0.55%；还有一些农民工从事包括仓储邮政、批发零售和设备租赁等在内的其他行业，占样本总量的14.99%。

表1 样本的基本情况

统计指标	项目	样本数(个)	比例(%)
性别	男	1004	68.16
	女	472	31.84
世代	新生代	944	64.36
	老一代	532	35.64
户籍地	本地	694	47.02
	外出	782	52.98
流动类型	家庭流动	678	45.93
	个人流动	798	54.07
行业	建筑业	330	22.34
	电子和机械制造业	290	19.62
	家政服务业	236	15.94
	纺织、服装业	152	10.35

饮食行业	86	5.86
商业	84	5.72
交通运输业	68	4.63
环境卫生业	8	0.55
其他	222	14.99

三、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及其群体差异

(一) 农民工受教育和工作经验状况

教育和干中学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两个重要来源 (Lucas, 2004), 因此, 大多数实证研究采用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年数来测量人力资本水平 (例如 Blundell et al., 2016; 严善平, 2007)。本文也运用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状况进行分析。

表 2 显示了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状况。从表 2 可见, 受访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7 年; 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比最高, 其次是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农民工, 这两种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样本总量的 76.42%, 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比例仅为 12.20%^①。从群体差异的 t 检验结果来看, 男性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显著低于女性农民工, 这与李卫东等 (2013) 的研究发现一致。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农民工承担着主要的“养家糊口”的责任 (韩洪云等, 2013; 李卫东等, 2013), 他们比女性农民工更早放弃学业而选择外出务工挣钱。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两代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11.01 年和 8.94 年, 接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 17.89%, 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1.91%)。这说明, 在国家发展教育的政策环境下, 随着世代的变化, 农民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加。此外, 本地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外出农民工。可能的解释是, 相对于本地农民工, 作为“外来人”的外出农民工, 要同时面临着由“农业—非农”户籍性质造成的“城乡差异”和由“本地—外地”户籍地点造成的“内外之别” (杨菊华, 2011)。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外出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福利的覆盖范围之外, 而具有本地户籍的本地农民工所能享受的公共教育资源 (如农民工本人继续教育和其子女本地就学的机会) 也就相对更多。

表 2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状况

分组类别		受教育年限(年)	受教育状况分布 (%)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学历
性别	男性	10.10**	11.93	46.12	31.81	10.14
	女性	10.61	10.21	40.00	33.19	16.60
世代	新生代	11.01***	4.42	39.16	38.53	17.89
	老一代	8.94	23.95	53.23	20.91	1.91
户籍地	本地	10.53**	9.51	44.09	34.29	12.11

^①这一结果与《2016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的结果比较接近。该报告显示,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 10.70%, 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占 77.40%,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 11.90% (国家统计局, 2017)。

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

	外出	10.04	13.04	44.25	30.43	12.28
总体		10.27	11.38	44.17	32.25	12.20

注：***、**、*分别表示群体差异的t检验结果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有研究指出，在城市务工和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受到周围生活环境和城市居民价值观念的熏陶，一些农民工的教育理念会逐步转变，他们更认同知识的重要性，也更加重视子女教育，从而在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教育投资上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叶静怡等，2017）。从调查情况来看，虽然受访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但多数农民工的确对其子女的教育有较高的期望，72.30%的农民工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接受以升学为目标的普通教育，只有27.70%的农民工倾向于让子女接受以技能提升为目标的职业教育。当被问及“您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有多高”时，有52.86%的农民工表示期望子女能接受“大学本科”教育，还有28.42%的农民工希望子女能接受“研究生以上”教育，只有少部分农民工认为高等教育用处不大，希望子女尽早务工挣钱。值得指出的是，受访农民工在表达对子女教育较高期望的同时，也表达出了强烈的受歧视感知。68.75%的受访农民工认为在子女就学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不平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就学受歧视的感知尤为强烈，认为子女受到就学歧视的比例达到75.80%。

教育通过间接传授的方式提升了个体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干中学则作为一种更早出现的技能获得手段，意味着个体需要在实践中通过不断总结经验而逐步成长，因此，工作经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工的技能熟练程度（吴炜，2016）。表3显示，受访农民工的平均进城务工年数为11.83年，其中，男性农民工的平均进城务工年数为12.60年，比女性农民工高出2.41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进城务工年数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平均进城务工年数差异并不显著。对调查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虽然多数受访农民工已有多年的务工经验，但是，过半的农民工工作状况并不稳定，只有48.44%的农民工近三年没有换过工作。男性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显著高于女性农民工，50.80%的男性农民工近三年没有换过工作，这一比例比女性农民工高出10.45个百分点（见表3）。周闯（2014）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并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是造成女性农民工工作稳定性低于男性农民工的重要原因。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显著更低，具体而言，60.94%的老一代农民工近三年没有换过工作，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仅为40.58%（见表3）。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更渴望成为市民，而通过工作转换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则是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途径。白南生、李靖（2008）的研究也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有非常显著的职业流动倾向，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则往往为了规避风险而倾向于不主动流动。分析结果表明，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工作稳定性的差异并不明显（见表3）。结合上述务工经验和工作稳定性的群体差异结果可以得出判断，务工经验可能对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除了进城务工的经历以外，务农经历也会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一定影响。钟甫宁、陈奕山（2014）认为，务农经历为进城农民工积累了体力劳动的经验，同时为其提供了一个“工资参照”，从而对其非农就业满意度和就业选择产生一定影响。从调查情况来看，有48.51%的农民工有过务农的

经历，受访农民工的平均务农年数为 2.93 年（见表 3）。务农经历的群体差异主要表现在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从性别差异来看，男性农民工的平均务农年数为 3.29 年，比女性农民工显著高出 1.17 年。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农民工在家庭照料和家务劳动上投入了较多时间，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务农的时间。从代际差异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务农年数分别为 0.95 年和 6.40 年，说明随着世代的变化，农村劳动力就业非农化的趋势明显增强。

表 3 农民工工作经验状况

分组类别		进城务工年数 (年)	务农年数 (年)	近三年工作转换情况 (%)			
				未换过	换过 1 次	换过 2 次	换过 3 次以上
性别	男性	12.60***	3.29***	50.80**	19.94	14.34	14.92
	女性	10.19	2.12	40.35	26.61	19.74	13.30
世代	新生代	8.46***	0.95***	40.58***	23.19	19.28	16.95
	老一代	17.93	6.40	60.94	12.07	10.27	16.72
户籍地	本地	11.86	2.94	49.28	18.16	16.14	16.42
	外出	11.81	2.92	47.68	19.07	15.98	17.27
总体		11.83	2.93	48.44	18.64	16.05	16.87

注：***、**、*分别表示群体差异的t检验结果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农民工健康人力资本状况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不仅能够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还能够减少生病的天数，增加劳动时间供给，从而对收入有重要影响（秦立建等，2013）。现有的实证研究普遍采用自评健康状况作为个人健康的测度指标。例如，Song and Sun（2016）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您认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其选项包括“非常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非常健康”，依次赋值1~5，分值越高，表示受访者健康状况越好。这一指标的优点是相关数据容易获取，同时又能够用于系统地评价受访者的总体健康状况（Idler and Kasl, 1995）；缺点则在于评价结果来自于个人的主观感受，而不同个体、地区和阶层之间健康自评标准会存在一定差异，从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群体间的比较。因此，参考Lu（2015）的研究，本文除了采用已有研究常用的农民工自评健康状况指标以外，还通过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①分析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从表4可以看出，受访农民工自评健康状况的平均得分为3.90，介于“一般”和“比较健康”之间。认为自己身体“比较健康”和“非常健康”的农民工比例为70.51%，仅有5.51%的农民工表示自己身体状况不佳。BMI计算结果也同样表明，绝大多数受访农民工的健康状况较好，只有8.32%的农民工的BMI低于18.5。

表4 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

分组类别	自评健	BMI<18.5	健康状况分布 (%)

^①身体质量指数是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指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BMI 低于 18.5 属于偏瘦，高于 30 属于肥胖，会增加患其它疾病的危险。由于农民工群体中肥胖的人数比例较低，所以本文参考 Lu（2015）的做法，并未考虑肥胖的情况。

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

		康状况 得分	的比重 (%)	非常 不健康=1	比较 不健康=2	一般=3	比较 健康=4	非常 健康=5
性别	男性	3.94 ^{***}	6.61 ^{***}	0.20	4.83	22.99	44.99	26.99
	女性	3.83	11.11	0.72	5.56	25.60	45.25	22.87
世代	新生代	4.11 ^{***}	5.65 ^{***}	—	1.89	19.84	43.37	34.90
	老一代	3.81	14.36	0.57	6.53	25.82	45.85	21.23
户籍地	本地	3.92 ^{***}	7.10 ^{***}	0.43	5.08	22.37	45.75	26.37
	外出	3.81	12.90	0.29	5.22	30.00	42.61	21.88
总体		3.90	8.32	0.40	5.11	23.98	45.09	25.42

注：***、**、*分别表示群体差异的t检验结果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健康水平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农民工的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农民工（见表4）。然而，从表5来看，男性农民工的城镇医疗保险参保率、本地社会支持状况以及健康理念却都明显落后于女性农民工。产生这种反差可能的原因是：除了表5中列出的几个可能影响农民工健康的指标外，农民工的健康状况还会受到家庭（如子女和老人照料）、所从事行业、生活习惯（如饮酒或吸烟）和情感（如受歧视和孤独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①（Lu and Qin, 2014），农民工的健康水平是各类因素此消彼长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同因素对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例如，秦立建等（2014）研究发现，小孩数量对女性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男性农民工的影响并不显著。李卫东等（2013）则认为，与男性农民工相比，女性农民工的情感需求更高，外出务工过程中所产生的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对她们健康的负向影响更突出。因此，造成上述反差的原因可以理解为，家庭和情感等因素对女性农民工健康状况所产生的负向影响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医疗保险、社会支持和健康理念等因素对其健康状况的正向影响，从而使女性农民工健康水平低于男性农民工。

农民工的健康水平还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和户籍地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水平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见表4）。这主要可归因于两代农民工的年龄差异；而从表5来看，相对较高的城镇医疗保险参保率、较好的社会支持状况和较强的健康理念也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水平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重要原因。此外，本地农民工的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外出农民工，意味着跨市和跨省迁移对农民工健康可能存在一定的损耗作用。理论上说，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状况既存在正向效应，也有负向效应（秦立建等，2014）。一方面，进城务工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从而提升其医疗支付能力，同时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城市先进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理念，对健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面临着工作环境恶劣、社会支持不足和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会导致他们健康状况恶化。根据表5中的统计结果，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在医疗支出和健康理念上的差异并不显著，但是，本地农民工的城镇医疗保险参保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新

^①由于本文侧重于分析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现状，而非影响因素，所以并未将可能影响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因素逐一列表5进行详细对比。

农合”)参保率都显著高于外出农民工,同时,本地农民工拥有本地关系网络的比例也显著高于外出农民工,意味着跨市和跨省迁移给农民工健康带来的正面影响并不明显,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比较突出。

表5 农民工医保参加、社会支持和健康理念状况

分组类别		城镇医疗保险 参保率 (%)	新农合 参保率 (%)	有本地朋友 (%)	医疗支出 (元/年)	重视体检和保健 (%)
性别	男性	30.59***	82.70***	75.74***	1030.45	74.10*
	女性	40.10	73.62	80.85	1001.33	79.14
世代	新生代	40.17***	78.53*	80.42***	836.62***	78.05**
	老一代	26.65	82.13	71.86	1352.65	71.48
户籍地	本地	39.36***	81.56**	80.69***	1042.35	76.65
	外出	30.74	78.26	74.42	1002.18	74.87
总体		34.26	79.81	77.37	1021.12	75.71

注:***、**、*分别表示群体差异的t检验结果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除了身体健康状况外,心理健康状况也是农民工健康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测量,目前主要包括量表测量(例如胡荣、陈斯诗,2012;聂伟、风笑天,2013)和单变量测量(例如龚晶、孙素芬,2014)两种方式。由于此次调查的内容涉及面较广而问卷篇幅有限,所以并未针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设计详细的量表,只能选择单变量测量方式。从已有文献来看,自评心理状况是使用频率较高的心理健康测量指标。例如,Lu(2010)通过虚拟变量“在过去的四周里是否有过悲伤的情绪”测量印度尼西亚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心理健康状况。参考这种测量方式,在调查中,采用问题“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是否由于情绪问题(如感到沮丧或焦虑)影响到您的工作或其他日常活动?”来考察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图1显示,占样本总量88.16%的农民工“很少”或“没有”因情绪问题影响到工作,只有11.84%的农民工表示工作状态“有时”或“总是”受到情绪的影响。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与男性农民工相比,女性农民工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受情绪影响的差异并不明显;与本地农民工相比,外出农民工因情绪问题影响到工作的频率明显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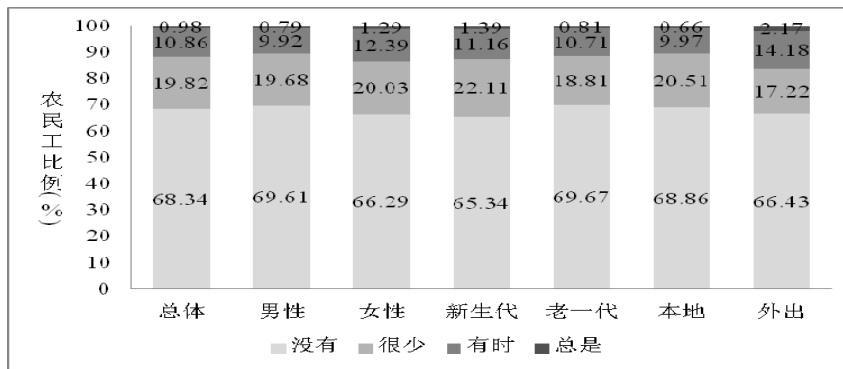


图1 农民工由于情绪问题影响工作的频率

(三) 农民工参加培训状况

一直以来，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并且将农民工培训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将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推进符合条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重要路径之一（卢小君、张宁，2017）。2014年，中国实施了“春潮行动”^①，明确提出了2020年前力争使每位农民工至少获得一次培训机会的目标（袁小平，2015）。

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前参加培训的状况是反映农民工人力资本初始存量的重要指标，表6显示，63.30%的农民工在进城以前未参加过培训，参加过1次培训的农民工占25.10%，还有11.60%的农民工参加过2次及以上培训。从群体差异来看，男性农民工参加过培训的比例比女性农民工高出5.35个百分点，且该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从事建筑、机械制造等行业的男性农民工比例较高，这些行业通常对从业者的技能水平有较高的要求；而女性农民工则主要从事家政服务、环境卫生等服务行业，这些行业对技能水平的要求相对较低。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培训的比例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16.53个百分点，且该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或许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更强的人力资本积累意识，也可能与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农村年轻劳动力人力资本投入有关。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前参加培训状况方面差异并不显著。

表6 农民工进城以前参加培训状况

分组类别		进城务工以前参加培训的状况（%）			
		未参加过	1次	2次	3次以上
性别	男性	61.60**	25.40	6.80	6.20
	女性	66.95	24.46	4.72	3.87
世代	新生代	57.42***	29.24	7.84	5.50
	老一代	73.95	17.62	3.07	5.36
户籍地	本地	62.03	24.93	6.96	6.08
	外出	64.43	25.26	5.41	4.90
总体		63.30	25.10	6.14	5.46

注：***、**、*分别表示群体差异的t检验结果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虽然农民工在进城以前参加过培训的人数比例较低，但是在进城以后，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比例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表7显示，74.68%的受访农民工进城以后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培训，这一比例比进城以前参加过培训的人数比例高出37.98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家关于农民工培训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民工进城以后平均参加培训的次数为1.83次，平均参加培训的时间为3.54个月。从群体差异来看，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在参加培训的人数比例和参加培训的次数上差异并不显著，但是，男性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时间（3.80个月）显著高于女性农民工（2.98个月）。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参加培训的人数比例上，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以后参加培训的比例比老一代农民

^①参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春潮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6号）。

工高出6.83个百分点，且该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体，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国家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提升的支持力度更大。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差异则主要表现在参加培训的时间上，本地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时间为3.97个月，显著高于外出农民工（3.12个月）。农民工培训对用工企业和务工地地方政府而言具有外溢性。随着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提升，他们外流到别的企业或城市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胡秀俊，2011）。与外出农民工相比，本地农民工更可能成为务工地稳定的产业工人，农民工用工企业和务工地地方政府给他们提供培训的机会也就相对更多。

农民工培训经费来源一直是农民工培训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难点。虽然国家建立了农民工培训补贴制度，但由于补贴标准较低，农民工承担培训经费的压力仍然很大（袁小平，2015）。从受访农民工最近一次参加培训的经费来源来看，务工单位支付和农民工自费是农民工培训费用的主要来源，农民工比例分别为45.19%和43.33%，还有8.70%的农民工参加培训的费用由政府、务工单位和农民工本人共同分担，只有很少部分农民工（占2.78%）的培训费用由政府支付。自己负担培训费用的农民工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经费负担程度。从表7可以看出，男性农民工中自己负担培训费用的（农民工）比例比女性农民工高出7.97个百分点，且该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面临的培训经费负担更重。这可能是因为，当农民工的技能水平难以满足目前工作的要求时，女性农民工能够更加容易地找到一些对技能水平要求较低的低端服务业工作（如当保姆、清洁员和餐厅服务员等），从而不用主动付费参加培训。老一代农民工中自己负担培训费用的（农民工）比例比新生代农民工高出4.66个百分点，但两者差异并不显著。本地农民工中自己负担培训费用的（农民工）比例（44.07%）和外出农民工（42.59%）比较接近，两者差异同样不显著。

表 7 农民工进城以后参加培训的状况

分组类别		进城以后参加培 训的比例 (%)	进城以后参加 培训次数 (次)	参加培训 时间 (月)	最近一次参加培训的经费来源 (%)			
					政府	务工 单位	自费	各方 分担
性别	男性	74.92	1.92	3.80**	3.01	42.35	45.90**	8.74
	女性	74.15	1.66	2.98	2.30	51.15	37.93	8.62
世代	新生代	77.11**	1.83	3.44	3.26	47.01	41.85	7.88
	老一代	70.28	1.84	3.72	1.74	41.28	46.51	10.47
户籍地	本地	75.69	1.90	3.97**	4.07	44.07	44.07	7.79
	外出	73.77	1.77	3.12	1.48	46.30	42.59	9.63
总体		74.68	1.83	3.54	2.78	45.19	43.33	8.70

注：***、**、*分别表示群体差异的t检验结果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当前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经费负担较重，但是，多数农民工有较强烈的参加培训的意愿。根据调查结果，绝大部分受访农民工表示愿意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占样本总量的78.94%。即便是自己负担培训费用，仍有59.21%的农民工愿意参加培训（见表8）。从表8显示的群体差异来看，愿意自费参加培训的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比例分别为58.65%和60.24%，两者差异并不显著。愿意

自费参加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65.26%）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同一比例（48.28%），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意识更强。本地农民工愿意自费参加培训的人数比例（62.24%）显著高于外出农民工的同一比例（56.52%），这可能是因为本地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和定居意愿更强，他们更愿意通过提高个人技能水平实现职业晋升。此外，从农民工所期望的培训时间来看（见表8），大多数农民工倾向于3个月以内的中短期培训，这类农民工占受访农民工总数的77.37%，其中，女性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更倾向于培训时间低于3个月的中短期培训，这也与表7中参加培训时间的性别差异和户籍地差异相一致。从代际差异来看，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3个月以内的中短期培训，尤其是培训时间低于1个月的短期培训，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文的判断，即老一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意识弱于新生代农民工。

表 8 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意愿状况

分组类别		愿意自费参加培训的 农民工比例 (%)	期望的培训时间 (%)			
			1 个月以下	1~3 个月	3~6 个月	6 个月以上
性别	男性	58.65	35.36	39.58	14.52	10.54
	女性	60.24	41.46	40.98	10.24	7.32
世代	新生代	65.26***	34.21	41.15	14.83	9.81
	老一代	48.28	43.46	37.85	9.81	8.88
户籍地	本地	62.24**	34.44	41.06	14.57	9.93
	外出	56.52	40.00	39.09	11.82	9.09
总体		59.21	37.34	40.03	13.13	9.50

注：***、**、*分别表示群体差异的t检验结果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有研究认为，农民工培训内容陈旧、定位不准确且没有充分切合农民工群体和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是现阶段农民工培训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此次调查考察了农民工对培训技能类型的偏好。调查发现，多数农民工对市场需求量大、容易找到工作的技能有较强偏好，这类农民工占受访农民工总量的49.78%；其次是预期赚钱较多的技能，占30.31%；还有19.91%的农民工偏好易学、容易上手的技能（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的技能偏好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男性农民工对建筑、运输、美容美发、服装加工、焊工、钳工等容易找到工作的技能有较强的偏好，而女性农民工则更倾向于家政、餐饮、文秘等易学、容易上手的技能。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强烈偏好市场需求量大、容易找到工作的技能，新生代农民工中则有较大比例的人偏好于数控机床操作、财会、通信、计算机应用等预期赚钱比较多的技能。这说明，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收入，还注重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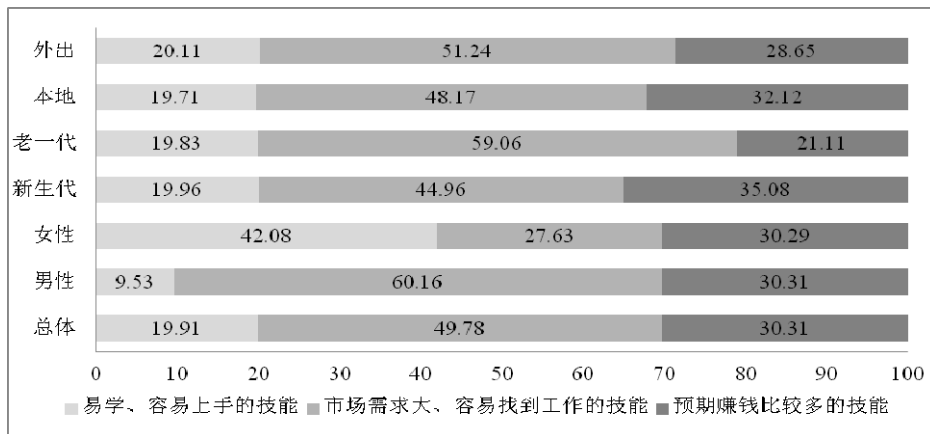


图2 农民工对培训技能类型的偏好 (%)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伴随中国传统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投入型经济增长模式开始难以为继，亟需探索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全面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成为释放新型人口红利、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农民工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激发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潜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显得尤为关键。这就需要准确把握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现状和群体差异，有针对性地制定推动农民工人力资本进一步提升的政策。

本文研究根据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利用 2016 年福建省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从教育、工作经验、健康和培训几方面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和群体差异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性分析。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当前农民工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但是，他们对子女教育有较高的期望；相对于男性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女性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本地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更高；一半以上的农民工认为子女就学受到了歧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歧视感知尤为强烈。其次，平均来看，农民工已经积累了 10 年左右的务工经验，务工经验的积累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将近一半的农民工有过务农的经历，随着世代的转变，农民工的务农年数明显降低。再次，从健康人力资本来看，多数农民工的健康状况较好，相比于就近就地迁移，跨市或跨省迁移对农民工的健康有更大的损耗。最后，与进城前相比，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比例在进城后有明显提升，尽管当前农民工接受培训的经费负担较重，但大部分农民工都有强烈的参加培训的愿望；有七成的农民工偏向于 3 个月以内的中短期培训；在培训内容的偏好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

（二）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建议

总体来看，当前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还处于较低水平，这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背景下，教育和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在城乡之间不平衡的结果。由于农民工初始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他们只能在城市从事工资水平低、劳动强度大和工作环境恶劣的工作。低微的收入使得农民工没有足够的能力进

行人力资本再投资，导致其人力资本积累陷入“低收入—低人力资本再投资能力—低人力资本形成效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王竹林，2010）。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民工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投资力度，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从长远来看，教育对提升一个国家劳动力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村教育被边缘化的境遇有所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是，农民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十分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实现稳定就业和融入城市社会。政府应积极探索实现农民工再教育的途径，推动建立政府、企业、高校和社会组织等多方联动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多渠道筹措农民工再教育经费的投入机制，为农民工提供更多接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决定着中国未来产业工人的整体素质，应该引起政府更高层次的重视。当前，由于一些城市教育资源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和以户籍为载体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制度，农民工子女“就学难”“上学贵”和“高考难”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因此，中央政府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快破除教育的二元结构，同时加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统筹力度，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支持地方政府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地方政府则应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和升学的相关政策细节，建立保障农民工子女各阶段教育的长效机制，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水平。

第二，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同时推进住房、养老和最低工资水平等其他公共政策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着力提升农民工的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医疗保险是促进人们健康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农民工的医疗保险覆盖率也有了明显的提升。然而，从现实来看，当前农民工所参加的医疗保险仍然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为主，多数农民工并未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在医疗保险实行属地化管理的状况下，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很难真正享受医疗保险的权益，从而在不同城市间流动的过程中面临着“断保”的困境。因此，未来的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应更加具体和明确，针对农民工流动性较强的特点，地方政府应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系，设计满足农民工需要的、能够负担的、方便的医疗保险。中央政府则应尝试建立跨地区的医疗保险补贴机制，弥补农民工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医疗筹资等级的差异。此外，应加快建立农民工和市民的城市公共资源共享机制，构建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支持网络，将农民工纳入社区服务管理的覆盖范围，促进农民工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多个层面的城市融入水平，增加农民工的保健知识，强化农民工的健康认知，多管齐下提升农民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

第三，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的资源，构建以市场力量为主导、政府和社会力量为辅助的多元化、分类化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着力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一方面，用人单位是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责任主体，这种主体地位是保证农民工有效培训的关键所在，应通过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加强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培训重要性的认识并强化企业的培训责任，采用税收减免和提高培训补贴等方式鼓励农民工用人单位积极开展岗前培训、资格培训、证书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政府培训与企业培训、专业学校培训以及社会培训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

关系，应积极发挥政府在制度环境建设和监管方面、职业院校在学历教育方面以及行业协会和工会等社会组织在示范宣传方面的优势，弥补农民工培训在培训成本和补贴、资源区域配置、权益保障、政府监管等方面的市场失灵。此外，在组织农民工技能培训时，需要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开展多层次、多种类的职业技能培训。例如，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与其父辈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更高，时间相对宽裕，理解能力更强，因此，在培训周期上，可以开展培训时间相对较长的职业培训，从而有效保障培训质量；在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方面，则可以选择一些更新更实用的技术。

参考文献

- 1.艾小青，2015：《我国农民工的总量变化及流动特征》，《中国统计》第10期。
- 2.白南生、李靖，2008：《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管理世界》第7期。
- 3.蔡昉，2013：《通过改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4.蔡昉、王美艳，2012：《中国人力资本现状管窥——人口红利消失后如何开发增长新源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4期。
- 5.程令国、张晔、沈可，2015：《教育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来自中国老年人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1期。
- 6.龚晶、孙素芬，2014：《保障模式影响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吗——基于对在京农民工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第9期。
- 7.国家统计局，2017：《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 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农民工培训实态及其“十二五”时期的政策建议》，《改革》第9期。
- 9.韩洪云、梁海兵、郑洁，2013：《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意愿与能力：一个经验检验》，《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10.何亦名，2014：《成长效用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11.胡荣、陈斯诗，2012：《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分析》，《社会》第6期。
- 12.胡安宁，2014：《教育能否让我们更健康——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城乡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13.胡秀俊，2011：《农民工培训有效供给不足的原因与对策研究》，《求索》第7期。
- 14.黄乾，2010：《教育与社会资本对城市农民工健康的影响研究》，《人口与经济》第2期。
- 15.蒋善、张璐、王卫红，2007：《重庆市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心理科学》第1期。
- 16.李宝值、朱奇彪、米松华、卢海阳，2016：《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职业技能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12期。
- 17.李强、龙文进，2009：《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
- 18.李卫东、李树苗、M·W·费尔德曼，2013：《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社会》第3期。
- 19.卢小君、张宁，2017：《农民工培训现状及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大连市调查为例》，《调研世界》第

4 期。

- 20.罗万纯, 2013:《中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状况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 21.聂伟、风笑天, 2013:《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精神健康——基于珠三角外来工的实证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22.秦立建、陈波、秦雪征, 2013:《健康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
- 23.秦立建、王震、蒋中一, 2014:《农民工的迁移与健康——基于迁移地点的 Panel 证据》,《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
- 24.王竹林, 2010:《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困境及其缓解出路》,《农业经济问题》第2期。
- 25.吴炜, 2016:《干中学: 农民工人力资本获得路径及其对收入的影响》,《农业经济问题》第9期。
- 26.谢桂华, 2012:《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27.严善平, 2007:《人力资本、制度与工资差别——对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6期。
- 28.杨菊华, 2011:《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人口研究》第5期。
- 29.叶静怡、张睿、王琼, 2017:《农民进城务工与子女教育期望——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科学》第1期。
- 30.袁小平, 2015:《农民工培训政策: 一个分析框架与顶层设计》,《社会建设》第4期。
- 31.苑会娜, 2009:《进城农民工的健康与收入——来自北京市农民工调查的证据》,《管理世界》第5期。
- 32.钟甫宁、陈奕山, 2014:《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与初次外出务工的职业选择——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摩擦性失业”的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 33.周闯, 2014:《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就业稳定性差异——兼论女性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双重负效应》,《人口与经济》第6期。
- 34.周广肃、谭华清、李力行, 2017:《外出务工经历有益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吗?》,《经济学(季刊)》第2期。
- 35.Becker, G. S., 1962,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5): 9-49.
- 36.Blundell, R., M. Costa Dias, C. Meghir, and J. Shaw, 2016, “Female Labor Supply, Human Capital, and Welfare Reform”, *Econometrica*, 84(5): 1705-1753.
- 37.Idler, E. L., and S. V. Kasl, 1995, “Self-ratings of Health: Do They Also Predict Change in Functional Ability?”,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50(6): S344-S353.
38. Lu, Y., 2010, “Mental Health and Risk Behaviour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Population Studies*, 64(2): 147-163.
- 39.Lu, Y., and L. Qin, 2014, “Healthy Migrant and Salmon Bias Hypotheses: A Study of Health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02 (2): 41-48.
- 40.Lu, Y., 2015, “Inter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Physical Grow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 Study of Two Settings”, *Health & Place*, 36: 118-126.
- 41.Lucas, J. R. E., 2004, “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S1): S29-S59.
- 42.Magnani, E., and R. Zhu, 2012, “Gender Wage Differentials among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42(5): 779-793.

43.Schultz, T. W.,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1): 1-17.

44.Song, Y., and W. Sun, 2016, "Health Consequences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in China", *Health Economics*, 25(10): 1252-1267.

45.Zhang, X., J. Yang, and S. Wang, 2011, "China Has Reach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4): 542-554.

(作者单位: ¹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²福建农林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

(责任编辑: 张丽娟)

The Status of the Human Capital of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Evidence from 1476 Samples in Fujian Province

Lu Haiyang Li Zuxian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human capital acquisi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 is very important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Based on effective sample data collected from 1476 migrant worker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16, this article, by employ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s, explores the status and group differences of their human capital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 work experience, health and train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migrant workers have very limite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Most of them have not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in colleges. However, they have high expectations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About 70% of rural-urban migrants consider that their children are discriminated in education. The feeling of being discriminated is particularly strong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s. The average number of working years in the sample population is about 12 years, but more than half of sample participants have strong job mobility. The accumulation of work experience can somehow improve their employment stability. Most of sample participants are in good health. Trans-local migrants a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deterioration of health status than local migrants. Despite great financial burde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sample have a strong desire to receive training.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ences exist in preferences for the duration and the content of training. Finally, the study provides a number of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cquisition of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 Human Capital; Health; Training; Group Difference